

This document is downloaded from DR-NT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Singapore.

Title	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 = The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of Lu Xun -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Lu Xun ’ s early translation career
Author(s)	崔峰 Cui, Feng
Citation	Cui, F. (2007). Fanyijia Luxun de ‘ Zhongjiewu ’ Yishi: yi Luxun Zaoqi Fanyi Fangshi de Bianhua Weili (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 [The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of Lu Xun -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Lu Xun ’ s Early Translation Career]. Zhongguo Fanyi (中国翻译) [Chinese Translator], 6, 14 – 18.
Date	2007
URL	http://hdl.handle.net/10220/42440
Rights	© 2007 《中国翻译》. This is the author created version of a work that has been peer reviewed and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by 《中国翻译》. It incorporates referee ’ s comments but changes resulting from the publishing process, such as copyediting, structural formatting, may not be reflected in this document.

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

——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

摘要: 从“中间物”意识的角度, 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翻译家鲁迅的翻译思想、翻译实践等方面进行阐发, 有助于我们认识鲁迅以翻译为途径, 在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开拓者、探索者的翻译家鲁迅在思想发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摇摆变化、矛盾错误或意气用事之处; 也有助于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去观察鲁迅与历史和未来的关系, 从而为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重新评估。本文试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 对鲁迅这一阶段的“中间物”意识进行阐发。

关键词: 鲁迅; “中间物”意识; 翻译方式; 现代性

The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of Lu Xun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es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Lu Xun’s Early Translation Career

Abstract: To explore issues in the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Lu Xun by combining the so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nd his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is helpful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role he played in pursuit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modernity, to understand the oscillation and conflict Lu Xun, a pioneer and explorer, experienced in thought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and to conduct a diachronic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u Xun and history and future. A re-evaluation of Lu Xun’s posi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is subsequently achieved. This paper elucidates Lu Xun’s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of his early translation career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changes in his translation methods.

Key Words: Lu Xun; the “intermediate” consciousness; translation methods; modernity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鲁迅研究界开始注重让鲁迅的意义实现某种回归——即回归对其“本体”的研究。更看中鲁迅作为普通人“自我”的一面, 而不是让他一直活在被膜拜的圣坛之上、笼罩在红色光环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 他留给后世的, 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历程中一个真实的横断面, 是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前 30 年艰难跋涉的途径。同样, 我的鲁迅翻译研究也注重对鲁迅“本体”的回归, 不会把鲁迅提出的翻译思想、技巧作为金科玉律来看待, 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也不会分析鲁迅与诸君的论战中先入为主地偏袒鲁迅, 否则就不是客观的研究态度。我将鲁迅翻译现象的研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 以一种回到当时历史处境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态度来考察鲁迅翻译现象, 包括其中出现的矛盾之处, 领会鲁迅翻译中出现的历史局限性。把翻译家鲁迅定位为一个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探索者、开拓者。

我们允许这样一位探索者出现思想上的摇摆、困惑、彷徨, 允许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有意气用事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能因为他曾被称作“民族英雄”, 而忽略、袒护这些片面、矛盾乃至错误的观念。正如鲁迅一再声称, 他“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 范本”(鲁迅, 1981(1): 286), 这绝不是谦词, 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过渡性。鲁迅绝没有终结一切, 无论他的思想、艺术以及他的个性、灵魂, 都不具有至善至美的特性, 他是无限运动过程中一个有限的环节, 他为无数的后来者铺平了“超越自己”的道路, 他的生命价值正是实现在这种“探索”“超越”之中。由此, 我发现了有强烈历史担当文化自觉的鲁迅, 其以翻译为途径, 处在中国文化转型、现代性探索的历史境遇中的“中间物”意识。

对鲁迅的翻译研究至今已有八十余年, 就我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 从 1924 年至 2005 年间, 国内外共发表鲁迅翻译研究论文 220 篇, 其中国内(含港台) 195 篇; 国外 25 篇; 工具书 1 部; 论著 3 部。在这些论文论著中, 还未曾发现有从“中间物”意识的角度对鲁迅翻译进行阐发的文字。

二

“中间物”源自鲁迅《写在〈坟〉后面》一文，当其论及白话文问题时说自己受古文的“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因而把自己及新文化运动者看作是“不三不四的作者”和“应该和光阴偕逝”的“中间物”（鲁迅，1981(1)：286）。

首先，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体现了他“希望跳出古老的生活方式，而又对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强烈的印象和痛苦”（汪晖，2000：107），这种意识有着强烈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汪晖，2000：106），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传统的关联和抗争，这涉及到他对整个人生的态度和对自身的历史评价。同时，鲁迅的这种“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从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对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自我肯定，就像鲁迅也曾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鲁迅，1981(1)：286）的历史的“中间物”一样，在对传统的反观之后，鲁迅同样也希望创造一种属于未来的原则。而他自己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蒙家就在这种与传统的某种绝裂和对未来原则的创造中不可避免地扮演着探索者的角色——这正体现了鲁迅对自身历史地位的一种肯定。

对于一个翻译家而言，其翻译活动、翻译观念（包括其文化观、价值观）、翻译实践（包括其翻译技巧、语言观）、成就与影响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通过上述观察视角，我发现了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已经全面渗透到其翻译思想、实践及其文化观、价值观中。现列举一二：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鲁迅，1981(3)：359）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鲁迅，1981(11)：20）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最初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我总还要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同成败而要战斗的人。（鲁迅，1981(11)：31—32）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鲁迅，1981(12)：8）

鲁迅对岛武郎《与幼小者》中的话大加称赏：

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象的了。大约象我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脚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鲁迅，1981(1)：362）

鲁迅对自己的人生定位由此可见，可以说他的“中间物”意识与他的“梯子论”其实是相通的。在鲁迅的翻译观中，这种意识也体现了出来。

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

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鲁迅，1981(10)：400）

仍苦不能通贯，费时颇大，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必不免。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或从原文翻译，那就更好了。（鲁迅，1981(10)：295—296）

鲁迅通过他的创作和翻译实践着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思想的启蒙家、探索者的人生定位。他通过翻译活动，在改造国民性、引起西方先进思想、改革白话文等方面都显现出其“中间物”意识。可以这样说，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国民性改造、语言文字改革，鲁迅选择的方法是一种因力图彻底而略显偏激的“破”，这固然有其在策略层面上的考虑。但正因为鲁迅把重心始终放在以“破”为“立”这一层面上，他对“立”的结果没有细加考虑，对未来希望的寄托可以说是鲁迅对“立”的结果的一种模糊意识。

三

现以鲁迅翻译生涯的第一阶段为例，对其“中间物”意识在翻译方式选择中的体现做一个案例分析。

鲁迅的翻译生涯如何划分，不同的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划分方式。其中多以鲁迅思想发展轨迹并结合其翻译作品的主题为划分标准：

柏起、韦文朔认为鲁迅早年的翻译作品主要是科学小说，后来他否定了科学救国的主张，决心改用文艺为武器。他从外国文学中“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着重介绍十九世纪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中富于反封建反侵略精神的作家和作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段时期，仍以反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文学为重点。主要介绍是巴尔干各国的“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作品；对北欧文学也十分重视，认为它“使读者界觉得新鲜”；这时期鲁迅还翻译介绍了不少童话作品。鲁迅一生的后期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点是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其次是翻译和评论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最后还翻译介绍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后期，鲁迅仍然保持着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热情。（柏起，韦文朔，1977）

谢天振认为鲁迅翻译活动的早期阶段从1903年到1918年，即留学日本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阶段的译介是多方面的，“但在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最有意义的是他与周作人的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奠定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第二阶段从1919年到1927年，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论争前夕，重点仍然放在俄国、日本等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黑暗的作品方面。后期从1927年到1936年，即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期，鲁迅侧重于译介苏联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谢天振，查明建，2004：83）执此相同分法的还有陈玉刚、袁锦翔等研究者。（陈玉刚，1989：165；袁锦翔，1990：131）

李万钧也提出了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三个时期，认为这和鲁迅思想发展的步伐大体是一致的。1903年到1911年为第一时期，鲁迅在“科学救国”思想指引下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并译述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与《哀尘》，作者认为“后两篇译文说明鲁迅开始从事翻译介绍文学时，就具有明确的倾向性：他要唤起抗清救亡的民族意识，主张文学要描写‘悲惨世界’”。1909到1919年鲁迅没有翻译介绍外国文学。1919到1927年为第二时期，鲁迅重点介绍了一些具有反战思想和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同时把目光转向日本文学。1928年到1936年是第三时期，翻译的重点已从日本转向苏联，“重视革命文艺理论，形成他这个时期译文的重大特色”，译文与前两个时期比较，“革命性大大加强了。概括来说是三句话：新世界代替了旧世界，社会主义代替了人道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代替了象征主义”（李万钧，1985）。

迄今还未发现有学者以鲁迅翻译方式的变换为其翻译生涯进行划分。若以此为标准，可分为：第一阶段1903年到1909年，早期的探索期，翻译方式摇摆不定。第二阶段，1909年到1928年，翻译方式以“直译”为主，带有“硬译”，“硬译”的对象主要是文艺理论著作。第三阶段，1928年到1935年，仍以“直译”为主，但“硬译”的成份主要体现在翻译俄国马列著作上面。

可以说，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鲁迅早期在翻译异域文学作品时主要采用了改译和直译两种翻译方式。但由于有学者在认识这一阶段鲁迅所采用的翻译方式时还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以致于这一极具代表性的错误使更多学者忽略了鲁迅早期翻译方式选择过程中的摇摆不定与探索精神，从而进一步忽略了他的开拓意义。而这方面恰是鲁迅“中间物”意识的体现。

晚清意译之风对鲁迅翻译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这两部科学小说时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欣赏，采用了章回体。《月界旅行》的日译本原为 28 章，鲁迅将它改译成 14 回，每两章一回，并配以工整的回目。“全书的译文也多有损益，应视为译述。”（郭延礼，1999：179）鲁迅自己后来也认为《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鲁迅，1981(12)：403）。而我所说的严重错误则来自于牛仰山先生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和鲁迅的关系》一文。作为出自中国鲁迅研究重阵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的这篇文章受到学者们推崇和广泛关注（包括海外学者的关注¹）自是情理之中。该文写于 1983 年以前，但 20 多年来仍有多位学者在引用此文中的错误观点，至少说明了这一观点几十年来非但未被纠正，相反已被普遍接受。比如郭延礼先生在总结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认为“在比较研究方面”牛先生的这篇论文具有代表性，“在诸多的参照系统中，更能准确地把握近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¹¹。郭先生之所以推崇这篇论文，其实在其相关论文中我发现他也犯了与牛先生相同的错误（下文将详述）。我们先来看牛文中的论述：

鲁迅着手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许是由于开始尝试，还不免带有对原作“改作”的痕迹，如《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按照原作直译。他自己后来也认为《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这种原因的造成，从主观上看，是“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从客观上说，乃是晚清意译之风对他的影响。但是，当他从严复的翻译主张中接受了“信”是翻译的第一要素后，很快就改正了原先意译的缺点，开始了直译。比如，他一九〇三年由日文转译法国雨果的《哀尘》，“除一处可能由于日译本误译外，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译”。（牛仰山，1989）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牛先生的思路：他认为鲁迅早期翻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鲁迅受晚清意译之风的影响以“改作”的方法翻译了《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等作品；第二阶段，严复提出了“信”的翻译主张后，鲁迅的翻译方式开始转变，《哀尘》就是其中一例。牛先生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是在 1898 年，而鲁迅的翻译生涯从 1903 年开始。因此，当鲁迅开始尝试翻译异域作品时，晚清的意译之风及严复“信”的翻译主张应是同时交织并存，共同影响了鲁迅的翻译。说白了《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是在严复翻译观点提出之后翻译出来的，按照牛先生的结论，为什么严复的主张偏偏影响了对《哀尘》，而未造成对《地底旅行》、《斯巴达之魂》两文进行直译呢？牛文中的观点给人造成了意译之风与“信”的翻译主张一前一后，此消彼长的印象——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翻译界的实际情况。另一个错误，也是前后顺序上的问题，按牛文中所述，鲁迅“改正了原先意译的缺点，开始了直译”，可见在作者看来《地底旅行》与《斯巴达之魂》的翻译在前，《哀尘》的翻译在后；改译在前，直译在后。可是早在 1963 年陈梦熊（熊融）先生就已考证出鲁迅的翻译生涯确是从《哀尘》开始的：“鲁迅自己曾说，他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的两年间，翻译过不少作品……根据最近我们对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时期史实的调查，发现有一篇中译名为《哀尘》的译文，也是他在这一时期所译的。这样，鲁迅的正式翻译工作，就应当是始于这一篇译文了。”（陈梦熊，2004：1）而后，当时尚在人世的周作人也肯定了“《哀尘》一篇，此确系鲁迅所译”（陈梦熊，2004：25）。戈宝权也对熊融的考证持以充分的肯定“从现在发表的《哀尘》看来，鲁迅早在一九〇三年就译过法国著名作家器俄（雨果）的作品”，并提到“尽管这篇文字的转译，但与原文却非常接近，熊融同志在说明中提到：‘如果根据法文原著略加核对，还可发现鲁迅虽据日译转译，但除一处可能由于日译本误译外，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直译。这样忠实于原文的译法，在意译盛行的当时，也是别树一格的。’我查阅了雨果的法文原作，确实是如此。”（陈梦熊，2004：17—18）这里，我要顺便提及上文所说的郭延礼犯的与牛仰山同样的错误，就是也认为“鲁迅早年翻译的几部科学小说虽然未能忠实原著，但后来译的《域外小说集》和《哀尘》，以及周作人的许多译作都是直译”（郭延礼，1999：107）。两位学者及很多研究者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鲁迅翻译生涯的开山之作《哀尘》（1903）竟直接采用了直译的手法；而其后的几篇小说又放弃了直译法，改为编译的形式，主要包括上文所提及的《地底旅行》（1903）和《斯巴达之魂》（1903）。另外采用了编译法的还有《造人述》（1905），熊融先生说鲁迅有仙台医专学习时“课余还是从事编译，致力于科学小说的介绍。《造人述》，即这一时期的译作之一”（陈梦熊，2004：5）。此外，我认为《北极探险记》

(1904) 编译的成份也很大, 因为鲁迅翻译这部作品时叙事用文言, 对话用白话, 当时托蒋观云介绍给商务印书馆, 不料不但不收, 还被编辑大骂一通, 说是译法荒谬。这部译作终未问世, 连原稿也不知去向。(鲁迅, 1981(12): 409) 而到了 1909 年, 鲁迅又在其《域外小说集》中的三篇译文中重新采取了直译的手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与其 1903 年用直译手法翻译《哀尘》之时相隔六年。

经过上面的梳理,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鲁迅早期的翻译方式经历了直译——编译——直译的过程,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简言之, 鲁迅当时初涉翻译工作, 一切还处于探索阶段, 出现翻译方法上的摇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正如我在前文所言, 我把鲁迅定位为一个中国早期文坛的探索者——他的探索包括了他寻思改造国民性之路、改革中国白话文之路、如何才能有效地引进异域文化思想与语言体系等等, 鲁迅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当时所说的话所从事的工作就应该定性如此。相反, 鲁迅向来“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包括他后来极力为自己辩护的“硬译”手法, 他也不认为绝对是好的, 如果出现了好的意译, 他同样是可以接受的ⁱⁱⁱ。他就曾坦然地说过: 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 能够译成既不曲, 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 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 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孙郁, 2004: 121) 这与他在中后期的翻译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直、意译相交织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正是一位探索者、开拓者把自己视作“中间物”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体现; 作为“中间物”者不可能呈现出思想上的一贯性、实践手法上的不变性。

鲁迅在当时同时受到了晚清意译风气和严复“信”的翻译主张的影响, 出现了翻译手法上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 急于把异域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之一, 以抵抗禁锢社会进步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当时的中国翻译界也是快译之风盛行, “壬寅癸卯间, 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一新书出, 译者动数家; 新思想之输入, 如火如荼矣”(梁启超, 1927: 29)。受此影响, 再加上迫切的引进异域文化的心情, 鲁迅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以尝试其翻译的效果能否达到翻译的目的, 所以在六年之内, 鲁迅在翻译过程就采用了直译、编译, 包括意译(如《月界旅行》)等手法。此外, 关于鲁迅的第一部译作《哀尘》就采用了直译法, 也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直译恰恰是鲁迅中后期使用最多、运用最为娴熟的翻译方法。除了我上面所阐述的原因外, 跟鲁迅自己所认为的翻译习惯也不无关系。《小彼得》原先是初学日语的许广平译的, 鲁迅校改之时“大加改译一通, 比较地近于流畅”, 为此鲁迅说, 初学外语者一开始就翻译, 是不大适宜的, “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 不敢意译, 令读者看得费力”(鲁迅, 1981(4): 151)。鲁迅 1902 年才到日本留学, 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 他在《哀尘》(1903) 翻译 26 年之后发此感慨, 应该是在许广平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作为一个日语初学者的翻译经历。

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摇摆与探索, 在六年间, 对翻译方式选择上的几度反复, 正是其“中间物”意识的一种不断反观和不断否定的过程。由于受到林纾的影响, 他改译了几篇作品, 但之后, 他开始反省到林译作品“误译很多”, “对此感到不满, 想加以纠正”(鲁迅, 1981(10): 155), 遂产生了“跳出古老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最终找到了一条他为之信奉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的翻译方式, 那就是直译, 以此达到其“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 自此始入华”、“籀读其心声, 以相度神思之所在”(鲁迅, 1981(10): 155) 这样一种长期、深远的效果。可以说, 鲁迅最终以直译为其中后期翻译生涯中最惯常使用的翻译方式, 正是在“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属于未来原则的“中间物”意识。

同时, 我们还可以看出, 鲁迅在这一阶段的探索过程仍是重在“破”的层面。从早年开始, 他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思维模式, 唯有“别求新声于异邦”才有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他在翻译方式上的不断反思与否定就是在寻求打破痼疾、“跳出古老生活方式”的途径。所以, 在“破”的层面上他显现出了异常绝决的带有偏激的态度。如他后来对青年人“不看中国书”(鲁迅, 1981(3): 12) 的号召, 汉字拉丁化的主张, 把直译推向极端的“硬译”, 都是他这种“破”的态度的体现。通过“破”, 鲁迅建立起了“直译”的“立”。但这一“立”的结果怎样, 显然鲁迅没有细加考虑, 当然他也无法预知未来。在中后期的翻译生涯中, 鲁迅有时会把其直译推向极端, 而采用逐字相对的“硬

译”，他也只能以一种希望将来有好的译家译本出现来淘汰他的译本的模糊意识考虑未来。所以，以“破”为“立”而寄希望于未来，始终是鲁迅“中间物”意识的核心。

此外，鲁迅的这种“中间物”意识与其在中国文化转型期所做的文学文化现代性探索紧密相联。我对“现代性”的定义主要有两层，一是与过去相对应的一种当代意识，它是一种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尖锐的两极对立，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体现在鲁迅身上，则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激烈批判，对古文的摒弃，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失望等方面。基于这层意义，便自然引申出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第二层含义，即向西方寻求“新奇”的前瞻性，一种受西方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影响的思想和文化意识。鲁迅在这层含义中的翻译家身份得以充分体现。把翻译作为他追求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手段之一（以往学者多以鲁迅创作来论述他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追求），通过翻译来改造国民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汉语语法等。“现代性”的第二层含义在鲁迅译作中得以大量体现，主要有两方面体现了翻译家鲁迅与其同时代学人在追求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不同之处：一是非同寻常地关注文学技巧，努力吸收俄国和东欧小说的某些主题和传统。二是，对现实主义理论和技巧干脆不感兴趣。李欧梵也认为“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鲁迅已经‘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李欧梵，2000：232）。因此，从追求中国文化现代性这一角度观察鲁迅的翻译实践、翻译思想应是颇为独特的。像杨义、杨联芬等研究者就从文学先锋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域外小说集》所译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前瞻性，已经超过当时那个时代读者的能力^{iv}。

应该说，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追求本身是一个长期且充满变数的过程，例如鲁迅对待中国古典文化决绝的姿态，体现了他的急切心境和文化策略；“彷徨”、“呐喊”之类，也是他现代性追求中的焦虑、思考、彷徨和孤愤。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会因为主、客观的原因而出现在思想、追求手段上的摇摆，这一点与其“中间物”意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四

从“中间物”意识的角度，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家鲁迅的翻译思想、翻译实践等方面进行阐发，有助于我们认识鲁迅以翻译为途径，在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开拓者、探索者的翻译家鲁迅在思想发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摇摆变化、矛盾错误或意气用事之处；也有助于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去观察鲁迅与历史和未来的关系，从而为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重新评估。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鲁迅的一些思想观念被后人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下来，并得以在实际中运用；还有一些部分同样也会因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被沉淀，甚至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他通过翻译倡导中文欧化的结果就对中文的发展产生了良性与恶性两方面的影响^v——但是，这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一个开拓者在其探索之初就做好了被历史淘汰的准备。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绝，不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鲁迅那样有着“中间物”意识的探索者们前赴后继、甘为人梯吗？他们虽也曾“彷徨”，但终不忘作为一个探索者的使命和信念——“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注释

ⁱ 可见老致钧《鲁迅的欧化文字——中文欧化的省思》，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 2005 年，第 30 页中对牛仰山一文的引用。

ⁱⁱ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理论述要》，《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544 页。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又发表于《文学遗产》2000 年第 3 期，客观上又是对牛仰山一文的推广。

ⁱⁱⁱ 鲁迅在《译文序跋集·艺术论〈小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295 页。）中就说：“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

^{iv} 可参考杨联芬：《作为“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杨联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杨义：《〈域外小说集〉的超前性》（《中国新文学图志（上）》杨义主笔 中井政良、张中良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

^v 关于鲁迅的创作与翻译中的欧化倾向对后来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参考老致钧著：《鲁迅的欧化文字：中文欧化的省思》，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台北，2005 年。

参考文献

- [1] 柏起、韦文朔. 鲁迅与外国文学, 鲁迅研究资料(2) [C]. 北京:北京鲁迅研究室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77.
- [2] 陈梦熊. 关于鲁迅译述<哀尘>、<造人述>的考说, 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鲁迅佚文佚事考释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3]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 [4] 袁锦翔. 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 [5] 郭延礼.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M]. 山东: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7]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8] 李万钧. 鲁迅与世界文学, 摘自俞元桂等. 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C]. 福建: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 [9]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7.
- [10] 鲁迅. 写在<坟>后面,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1] 鲁迅. 热风·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鲁迅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2] 鲁迅.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3] 鲁迅. 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4] 鲁迅. 三闲集·<小彼得>译本序,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5] 鲁迅. 译文序跋集·<俄罗斯的童话>小引, 《鲁迅全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6] 鲁迅. 译文序跋集·艺术论<小序>, 《鲁迅全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7] 鲁迅. 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言, 《鲁迅全集》第十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8] 鲁迅. 两地书·第一集四,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9] 鲁迅. 两地书·第一集八,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0] 鲁迅. 书信·致章廷谦(300321),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1] 鲁迅. 书信·致杨霁云(340515),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2] 鲁迅. 书信·致杨霁云(340506),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23] 牛仰山.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和鲁迅的关系, 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五卷 1949—1983[C],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 [24] 孙郁. 鲁迅书影录[M], 东方出版社, 2004.
- [25] 谢天振、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6] 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

——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

[作者简介] 崔峰，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硕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翻译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翻译史、翻译家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dannycui_2000@hotmail.com

[通信地址] Division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2 Nanyang Drive, Singapore 637721

[电话] 65-90941312